

百 年 沧 桑

# 中国国民党史

茅家琦 徐梁伯 马振犊 严安林 等著

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  
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  
败退台湾后，蒋介石、蒋经国与中国国民党  
李登辉与中国国民党

下册

 鹭江出版社  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百

年

沧

桑

# 听玉 国民党史

茅家琦 徐梁伯 马振犊 严安林 等著

下  
册

鹭江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百年沧桑——中国国民党史 / 茅家琦等著. —厦门: 鹭江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80671-148-1

I. 百... II. 茅... III. 中国国民党—党史  
IV. D693.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9742 号

**百年沧桑——中国国民党史**

(上、下册)

茅家琦 徐梁伯 等著  
马振铎 严安林

\*

鹭江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: 361004)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: 350011)

开本 890×1240 1/32 49.625 印张 4 插页 1163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80671-148-1/K·10  
(上、下册) 定价: 120.00 元

**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**

## 导言

关系等方面的演变都与国民党的活动联在一起，因此本书从第三章到第八章，以6章的篇幅分别研究了“戒严体制”与“白色恐怖”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、地方自治与增补“中央民意代表”、教育与科学研究事业的整顿与发展以及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。

第九章从蒋介石逝世、蒋经国上台，写到国民党“十一全大会”及“十二全大会”两次代表大会。

第十章重点写蒋经国发动政治改革的来龙去脉，及其历史意义。



# 第一章 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挣扎

## 第一节 国民党中央南迁

### 一、“总统府”迁广州，李宗仁回桂林

中国人民解放军三路主力迅疾越渡长江天堑后，南京岌岌可危，国民党政权面临灭顶之灾。1949年4月22日上午，蒋介石由溪口飞抵杭州，紧急邀约李宗仁、何应钦、汤恩伯、白崇禧、张群等人到杭州举行秘密会议，“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”。

蒋介石从幕后窜到台前，违背了当着李宗仁面许下的“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事”之诺言。李宗仁、白崇禧商议借机向蒋摊牌，准备提出一个令蒋两难抉择的方案：要么蒋复职，李仍任副总统；要么蒋交出军政财权给李宗仁，二者必居其一。然而，令桂系始料不及的是，蒋介石在会上以“加强党与政府联系”为名，提议成立一个凌驾于党政部门之上的最高决策机关——“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”，代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职权，由中国国民党总裁任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，由

中华民国副总统、“代行总统职权”的李宗仁任副主席，由蒋介石、李宗仁、孙科、居正、于右任、何应钦、阎锡山、吴忠信、张群、吴铁城、朱家骅、陈立夫等十二人任委员，由洪兰友、程思远任正副秘书长。对此建议，满座政要皆附和，李宗仁亦不便加以反对。这样，蒋介石从李宗仁手中收回了他曾经交付“代行”的总统大权。

杭州军事会议还决定：（一）与共产党坚决作战，奋斗到底；（二）联合全国“民主自由人士”共同奋斗；（三）由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，统一指挥国民党陆海空三军；（四）采取紧急有效步骤，加强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。<sup>①</sup>此外，会议还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于23日由南京迁往广州，强调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，党内不许再倡和”。至此，蒋介石在与桂系角逐中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：挟迫桂系对抗中共，利用中共剪除桂系。

在大厦将倾之际，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却仍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厮杀。如此腐败的政权即便是它的美国盟友也为之失望和寒心。在5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，有如下报告：

虽则政府已面临绝望之情景，且所有领袖均认为必需继续抵御共军，但李与委员长权力上之基本冲突仍未解决。委员长发表公共宣言，谓即使战争将继续三年，彼对最后胜利仍有信心。彼对李氏表示拥护，但未表现彼确有放弃权力之意向，而李、白二氏更增愤懑。此种争执可能将继续妨害政府之抵抗能力。<sup>②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申报》，1949年4月23日。

<sup>②</sup> 美国国务院：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》，第181页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1949年4月23日，解放军攻克了南京的北大门——浦口。此时南京城内已一片混乱，国民党各军政机关纷纷撤离南京，迁往广州和上海等地。上午9点，李宗仁怀着满腔悲凉由明故宫机场乘专机离开南京。何应钦、顾祝同等军政大员也于当日逃离南京。

李宗仁登机离开南京后，并没有去广州，而是回到了老家桂林。他一直深为自己徒具代总统虚名、处处替蒋背黑锅的处境而悲愤，迟迟不肯赴粤。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、省教育厅长黄朴心等为促李宗仁走和平之路，趁机补签“国内和平协议”。李宗仁亦听取了程思远、邱昌渭的建议，准备组府桂林，继续以“和平大义”号召西南。为此他派人与广东张发奎联系，并寻求美国援助，均未获结果。

李宗仁在桂林的这些活动使蒋介石十分担忧。对蒋来说，他还需要李宗仁出来支撑门面。5月初，蒋介石授意居正、阎锡山、白崇禧等赴桂请李回粤坐镇。李宗仁趁机提出了六条方案作为回粤的先决条件。这六条方案的内容为：第一，国防部应有完整的军事指挥权，蒋介石不得在幕后指挥；第二，关于人事权，由总统暨行政院长执掌全国官吏任免，蒋介石不得从幕后干预；第三，中央金融、企业等机构，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，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，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、金钞，须一律交出，以支付军政费用；第四，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，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，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，在穗之政府机关，应率先奉行；第五，国民党只能依照普通政党规定，协助指导从政党员，不得干涉政务，控制政府；第六，关于蒋介石的出路，希望其“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，免得军政改革”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第636～637页。

5月4日，阎锡山携此六项条件专机飞沪，与蒋介石长谈三日。蒋对李的一揽子要求非常震怒，但为了能把李继续绑在“勘乱”的战车上，只好违心地表示，一切权力交出，他五年之内，亦不复过问政治。但对让他出国一事，蒋以“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”为由断然拒绝。

5月7日，阎锡山、朱家骅、陈济棠携蒋的复函，再次赴桂迎李返粤。白崇禧也专程飞桂劝李宗仁无论如何需“回粤主政”。白崇禧之所以持此种态度，原因在于白对李宗仁上任以来的表现相当失望，加之蒋介石又秘密拨给他3万两黄金，自己阴存与蒋妥协之意。由于白握有桂系军事大权，是李的台柱子，李只得听从，将桂林组府计划抛在一边，于5月7日飞赴广州，“为防止中国赤化，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”。<sup>①</sup>抵穗当日，李即发表谈话，号召国民党各级军政人员及民意机关，“一致奋起，协助政府完成此安邦定乱之重任”。<sup>②</sup>李宗仁此举，当时即遭到章士钊、邵力子等人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抨击。

## 二、蒋介石退台，建立“总裁办公室”

杭州会议后，蒋介石仍回溪口。4月24日，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：

南京业经弃守……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，前途充满暗影，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，不可言状；正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情景也。窃念家园虽好，未可久居。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……下午妻儿飞台；遍地烽烟，未往送行，此心亦有所不忍也。

中午，奉父亲嘱咐说：“把船只准备好，明天我们要走

---

①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第637页。

② 《申报》，1949年5月9日。

了。”我当即请示此行的目的地点，父亲没有回答。当时只好准备一艘军舰，听候命令。舰名太康，舰长黎玉玺中校晚间问我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领袖明天准备到什么地方去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看来，目的地不外两个地方，一是基隆，一是厦门。”

4月25日，蒋经国在日记中又写道：

昨日妻儿走了，傍晚到丰镐房家中探望，冷落非常，触景伤怀。

上午，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，再走上飞凤山顶，极目四望，溪山无语，虽未流泪，但悲痛之情，难以言宣。……天气阴沉，益增伤痛。大好河山，几至无立锥之地！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，今一旦抛别，其沉痛之心情，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。……下午3时拜别祖堂，离开故里，乘车至方门附近海边，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舰。……登舰后，父亲才说出要去的地方：“到上海去！”<sup>①</sup>

4月26日上午“太康”号进入吴淞口，27日蒋介石驻进市区金神父路励志社。

蒋介石从溪口去上海，完全是为了表现他“困兽犹斗”的精神。他听取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报告，并“指示方略”，27日又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发表文告，表示要“奋斗到底”。<sup>②</sup>

5月4日，杭州解放。6日，蒋介石父子登上“江静”轮，7日晨“江静”轮从上海复兴岛启碇南下。蒋经国在当日日记中

---

① 以上引文见蒋经国：《危急存亡之秋》，载《蒋经国先生全集》第1册，第426～427页。

② 《蒋经国先生全集》第1册，第428页。

云：“如大海中的孤舟，四顾茫然”。<sup>①</sup>

“江静”轮南下，到达定海。5月17日，蒋介石、蒋经国乘飞机从定海到达马公。5月22日，陈诚、俞鸿钧、蒋鼎文三人到马公与蒋介石会晤，下午陈诚回台湾。

5月26日，蒋介石自马公飞台湾冈山转赴高雄寿山。<sup>②</sup> 蒋介石为什么不直飞台北，而飞冈山转高雄寿山？这一决定是蒋介石22日与陈诚等会晤时作出的，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。

蒋经国亦于6月1日经台北飞冈山到高雄与蒋介石会合。直至6月21日，即到达台湾以后25天，蒋介石带着蒋经国才从高雄到达桃园转至大溪。

蒋介石属意台湾，看来起源甚早。1946年10月，蒋介石巡视台湾时就说过下列一段话：

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，可视为一片净土。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，使之成为一模范省，则俄、共虽狡诈百出，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，其将无如我何乎！<sup>③</sup>

早在1948年底，蒋介石在南京谋议下野之前，即未雨绸缪，为退守台湾先做安排。他认为“有台湾在，即使大陆尽失，也可复兴”，并向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表示：“台湾在短期内即将成为中国反共之新的希望。”<sup>④</sup> 蒋介石当时的一个重要部署，即是任命其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，总揽台湾全省的军政大权。

但是，最后决定退台，则是在上海解放前夕，从上海乘船南

---

① 《蒋经国先生全集》第1册，第433页。

② 《蒋经国先生全集》第1册，第441页。

③ 古屋奎二执笔、日本产经新闻社：《蒋总统秘录》第14册，第68页。

④ 朱传誉编：《中国国民党与台湾》，第172页。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，1964年11月出版。

下到达定海以后的事。1987年，蒋经国接见国民党“立法委员”党部有关人员时说过下列一段话：

回想民国三十八年，总裁在共匪全面叛乱后，准备重新调整战略部署，当时曾提出三个方案，其一是转进到西康，其二是撤至海南岛，其三是播迁到台湾。最后总裁在定海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，选择了第三方案——播迁台湾。<sup>①</sup>

又据蒋经国在1949年5月16日的日记中说，这一天在定海举行了中央政治会议。5月17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又记：

4时50分飞抵马公降落，父亲即至马公城外之宾馆驻节。此岛实一平滩，并非山地，气候颇热。……父亲自本年1月21日“引退”以来，家乡遨游，将阅四月；在此百余日中，虽心怀邦国，而闲情逸致，不减当年，盖亦唯有在宁静中更能致远耳。此时中枢无主，江南半壁，业已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父亲决计去台，重振革命大业。从此已无缘再享此人间清福矣。<sup>②</sup>

可见，决定去台一事，拍板于1949年5月16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上。5月18日，台湾省即简化入境申请手续，一些国民党军政机关和人员陆续迁入台湾。

4月22日的“杭州会议”上决定于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“非常委员会”，凡政府重大政策，先在党中获得协议，再由政府实施。事后，孙科认为，非常委员会应设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，不宜隶属于中央常务委员会。7月14日，蒋介石由台北飞往广州，16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委员会，蒋介石任主席，李宗仁任副主席，洪兰友为秘书长、

---

① 《蒋经国先生全集》第15册，第439页。

② 《蒋经国先生全集》第1册，第439页。

程思远为副秘书长。非常委员会于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迁往重庆，11月又迁往成都，12月11日再迁往台北，1950年8月7日结束。

非常委员会的结束是因为蒋介石建立了“总裁办公室”垄断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工作。

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到达台北后，24日即迁居草山，并决定设置总裁办公室。8月1日总裁办公室正式在草山开始办公。<sup>①</sup>草山亦改名为阳明山。总裁办公室下设九组一会。九组是：

第一组掌管党务，组长谷正纲，副组长蒋经国。

第二组掌管经济，组长吴国桢（副组长从缺）。

第三组掌管军事，组长王东原，副组长唐君铂。

第四组掌管宣传，组长董显光，副组长沈昌焕。

第五组掌管国际问题研究，组长陶希圣，副组长蒋君章。

第六组掌管秘书业务，组长张其昀，副组长周宏涛、曹圣芬。

第七组掌管情报，组长唐纵，副组长张师。

第八组掌管警卫，组长施觉民，副组长楼秉国。

第九组掌管总务，组长陈舜珩，副组长黄寄慈。

一会即设计委员会。上述九组正、副组长，除个别人员外，都位列设计委员会。<sup>②</sup>

蒋介石在台北建立了总裁办公室，重用了一批年龄较轻、有工作能力的亲信，组成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核心。掌管党务的谷正

---

① 蒋经国：《危急存亡之秋》，载《蒋经国先生全集》第1册，第458页。

② 以上名单录自李云汉：《中国国民党迁台前后的改造与创新》，载《中国国民党史论文选集》第5册，第605～607页。

纲是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代的同学，与蒋经国关系至为密切。张其昀原是浙江大学的地理系教授，是蒋介石的同乡，填补了陈布雷逝世以后蒋介石贴身幕僚的职位。

这个总裁办公室的成立，实际上代替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有机构的职能与工作，也拉开了中国国民党的“改造运动”的序幕。以后所有“改造”活动都是由这个办公室策划、推动的，而具体操纵这项工作的，除蒋介石本人外，就是谷正纲、蒋经国与张其昀。

### 三、阎锡山“组阁”与银元券的发行

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，广州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共声浪却甚嚣尘上，他们对李宗仁一再施加压力。5月13日，立法院通过《为中共破坏和平支持政府对中共继续作战之决议》，并通过向孔祥熙、宋子文、张嘉璈征借美金的紧急动议。16日，国民党中央会议决：如有再倡议“和平”，中途妥协或妄发求和言论者，应视同叛逆，予以党纪国法之处分。<sup>①</sup>17日，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财粮会议，决定向西南各省人民勒索巨额军粮，仅四川一省“征借”数量即达1350万担。21日，李宗仁发表《告全国同胞书》，承认国民党处境“相当恶劣”，但仍表示要顽抗到底，号召“全国同胞以最大努力，来与政府合作，达到自救救国的任务”。<sup>②</sup>

然而，空洞的叫喊对于严峻的局势根本无济于事。蒋介石的承诺依然是一纸空头支票，李宗仁依然是军权、财权、人权全无。在内外交困中，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长还不足三个月的何应钦被迫辞职。于是，围绕着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，蒋李之间又展开

---

<sup>①</sup> 程思远：《李宗仁先生晚年》，第93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申报》，1949年5月22日。

了一番明争暗斗。

何辞职后，李宗仁首先想到的继任人选是居正。但居正曾有反蒋的言行，为蒋所忌。故当李宗仁提议居正任行政院长时，蒋即授意 CC 系立委设法阻挠。在 5 月 30 日的立法院会议上，李的提案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。李威信受损，迫不得已，改提“善于观风转舵，素以手腕圆滑著称”<sup>①</sup>的阎锡山组阁。

6 月 3 日，立法院在广州召开会议，决议阎锡山继任行政院院长。6 月 12 日，阎锡山的所谓“战斗内阁”拼凑完毕，阎自兼国防部长，朱家骅任行政院副院长，胡适任外交部长。

在太原输光了本钱的阎锡山，摩拳擦掌地企图在广州重整旗鼓。但他上台后遇到的首要难题，便是如何解决财政困境。当时，每月需支出军费 3000 万银元，政费 1500 万银元。合计 4500 万银元。但国库的收入，每月仅 1000 万银元，每月差额达 3500 万银元。<sup>②</sup> 阎锡山内阁期望通过开源节流和动用运台库存两种手段，以达到收支之平衡。然而，由于国统区地盘日渐萎缩，工商交通事业渐处瘫痪和停滞状态，增加财政收入完全是痴人说梦，于是决定“推行临时财产税”，发行“爱国公债”3 亿元，并举办“爱国捐，捐献银元 1 亿元”。<sup>③</sup> 但是，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之中，这些措施未收到任何实际效果。至于动用运台库存，蒋介石“只允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 1200 万银元，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 2300 万银元”。<sup>④</sup>

为跳出财政绝境，李宗仁和阎锡山又把希望寄托于币制革新上，策划发行银元券以取代“贬值太甚”、“各地均予拒用”、“事

---

①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第 649 页。

②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第 649 页。

③ 中央通讯社，1949 年 7 月 5 日电讯。

④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第 652 页。

实上已失去流通之效力”<sup>①</sup>的金圆券。7月2日，行政院在广州正式公布《改革币制令》，同时公布了《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》，进行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币制改革。

在银元券刚刚出笼的时候，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徐堪信誓旦旦地表示：银元券的发行，“为我国军事、政治、经济起死回生之枢机，必须竭尽全力为之保持”。<sup>②</sup>然而，无情的现实使徐堪的这一誓言变成了戏言。由于银元券既无充足的准备金，又无起码的信誉，甚至连统一的货币形式也没有，商店、机关、军队都纷纷拒用银元券，挤兑风潮不断发生，物价指数继续猛涨。据李宗仁回忆：

“银元券”于7月4日开始发行之后，中央银行每日仅开一小门，允许市民兑现。市民挤兑的百不得一，因此“银元券”很快地变成“金圆券”第二，通货膨胀一泻千里。各地农民拒收“银元券”，各路大军军粮无法补充，后方人心惶惶。<sup>③</sup>

银元券的发行，连同阎锡山内阁为挽救危局而苦心炮制的诸项举措，皆在南下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中迅速化为泡影。

#### 四、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

在广州政府苦撑残局的同时，蒋介石既没有“将一切权力交出”，更没有“不复过问政治”，而是开始考虑如何从幕后走向前台。他带领一帮心腹干将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台湾和福州、厦门、舟山、广州之间，频频发号施令，亲自部署浙、闽、粤沿海和各海岛的防守事宜，幻想守住东南沿海，确保台湾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1949年6月10日签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<sup>②</sup> 《1949年7月16日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徐堪的财政金融报告》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<sup>③</sup>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第652页。

在这期间，蒋介石还先后出访了菲律宾和南朝鲜。7月10日，他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偕王世杰、吴国桢等自台北飞菲律宾碧瑶，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举行会谈，除谋求组织“太平洋反共联盟”外，还试探将来在马尼拉设置蒋记“流亡政府”的可能性。经过三次密谈，11日发表了《联合声明》，扬言“两国应立即组成联盟，互相援助，以抵制并消除共产党的威胁”，并鼓吹组织所谓“国际志愿军”，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。8月6日，蒋介石又由定海飞到南朝鲜镇海。7日，他与李承晚商讨“发动远东各国反共联盟的具体步骤”。8日，双方发表《联合公报》，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，以促成“联盟”的实现。蒋介石企图以此“与美国取得联系”，“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”。<sup>①</sup>然而，此时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，对蒋的这一“呼吁”置之不理。

自从在杭州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设想后，蒋介石便一直为其得以实施而积极筹划。5月下旬，当李宗仁向蒋请示何应钦辞职后的内阁继任人选时，蒋即趁机催促李抓紧非常委员会的设立。6月11日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非常委员会委员名单。7月14日，蒋介石率领26名国民党中央执、监委员从台北专机飞赴广州。7月16日，蒋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召集国民党中常会，通过议案，正式组成中央非常委员会，蒋介石任主席，李宗仁为副主席，政府的一切决策措施，都必须事先经过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为有效。此后，非常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，讨论通过蒋介石提出的《本党改造案》和阎锡山提出的《扭转时局案》、《反共救国案》等，并决定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西南、东南两个分会，分别以张群、陈诚为主席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董显光：《蒋总统传》，第529页。

通过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设立，蒋介石再次获得了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权。李宗仁对此极为反感，认为该机构“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，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”。他在其《回忆录》中对蒋介石的此举发出如下怨言：

数月以来，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、军事、财政的崩溃；如今他再利用此一“非常委员会”加以控制，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。……蒋先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“非常委员会”主席，无异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。如此他屡次声言五年内不问政治，非自欺欺人而何？<sup>①</sup>

## 第二节 国民党党政机关再迁重庆、成都

### 一、蒋介石与李宗仁在防御重点上的分歧

据李宗仁回忆，当时蒋介石的战略设想是：控制川、滇，把大西南作为后方；“退保台湾，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，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，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”。<sup>②</sup> 为贯彻这一战略意图，蒋介石一直主张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具体防御重点。7月18日，国民党广州政府决定在台北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，由陈诚挂帅，辖苏、浙、闽、台、琼五地区。7月23日，蒋介石在厦门召集朱绍良、汤恩伯、李延年等高级将领开会，专门部署福州、厦门、金门的防务。蒋介石当时在东南的军事部署为：浙江省主席周晷、舟山防卫司令石觉率3个军约6万人据守舟山群

---

①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第650页。

②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第621页。